“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任上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有一种“老镢”，比普通镢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镢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洞房。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呲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个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呢！”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办法，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生产队跟我们商量：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只要努力干了，不看结果，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

当时，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5分，我们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气，去找队长据理力争：“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技术虽然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实在没法接受！”队长很好说话，就说：“那好，你们也是8.5分。”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还只是6.5分。不过，这就不能怪队长了，只能怪我们自己懒。每天的8.5分里面，早工占了2分。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那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队长就说：“你们又不出早工，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

我就说：“你又不叫我们，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我们要挣工分。”

队长说：“那好，明天就叫你们。”我们在北京上学时，即使家住得远，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床，住得近的，七点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够。这一下四点钟起床，我们实在适应不了。当时是冬天，本来就睡不醒，四点多钟，天还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

采访组：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队长就来叫我们了，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路很远，要很长时间。于是，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

“京生儿——喔——”

“戴明儿——喔——”陕北的这种地貌，黄土高原，经流水冲击，河沟纵横交错，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喊话的时候，乡亲们会带儿化音，会用高音，又会拉长音，所以显得嗓音很嘹亮。陕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脱胎于此。而且，他们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队长喊了一阵子，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会儿，队长又喊：

“近平儿——喔——”

“燕生儿——喔——”喊完了，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队长又喊：

“家宁儿——喔——”

“平生儿——喔——”“……”

队长憋足了劲，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声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强，我正在做梦呢，就被喊醒了。

我睁开眼睛，一片漆黑，我说：“哎呀，什么动静？”近平也醒了，他说：“好像是队长喊。”我说：“这是叫咱们起床呢？”王燕生说：“几点了？”

杨京生说：“三点多。”我说：“睡睡睡！不理他！”

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我们的名字，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队长，队长一脸铁青。我就故意说：“哎！队长，你怎么不喊我们？早工误下了吧！”

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还说没喊你们？我都快喊岔气了。”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带我们劳动，教我们生产技术，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后来，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回忆起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也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

还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

——读陈云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 高广景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陈云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发现，一部分领导干部自认为在抗日战争中有功，渐生骄傲之心，不愿听取批评的意见，影响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健康发展。陈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在党的七大上就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加全党的力量作了系统阐述。这部分讲话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为题收入了《陈云文选》。今天读来，仍能从中获得重要启迪。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摆正个人位置。延安时期，陈云在通过与各地来延安的干部接触中发现，有的干部“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正确认识个人的功劳，摆正自己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的位置。对此，陈云明确指出，功劳里头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而决不能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只有正确认识工作中的成绩，才能在工作中克服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心态，才能不居功自傲、客观看待自己的“功劳”，才能放下姿态、听进别人的意见。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个人的认识能力往往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反映事物的全貌。陈云指出，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你也做到了十分，这种情形很少。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因为你自己有缺点，只做到八分或六分、五分，这种情形是很多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客观情况很好，本来可以做到十分，但是因为自己有错误，成绩一点没有，缺点蛮多，或成绩只有二分、一分，错误有八分、九分。为了使自己的认识更全面，尽量避免工作发生错误，陈云主张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讲真理，不讲面子，汲取他人的合理意见，进而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陈云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实事求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讲真理，不讲面子。他指出，只要态度正确，有错误也不要紧。“假如你有错误，人家讲了，就请教请教，问一问人家怎样看法，纠正一番，以后可以少犯错误。”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他解释道：有时候愈要面子，将来可能愈要丢脸。只有不怕丢脸，诚心诚意改正错误，将来可能还有些面子。共产党员随时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他号召全体党员干部“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

陈云这一论述的要义在于，必须站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立场，决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具有坚强的党性，才能时刻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敢于向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敢于提出真知灼见乃至尖锐的批评，才能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和诚恳接受他人的诤言挚语。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关键：领导干部带头。陈云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带头。之所以如此，有两点主要原因。第一，“我们工作的好坏，决定着中国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兢兢业业，所有坏的东西，一切应该丢的东西，统统丢掉。我们要在老百姓面前，负起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做，便没有尽到责任。非此，不能增加全党的力量。第二，领导干部一旦有个人主义思想，就会背上大大的“包袱”，而且级别越高，造成的危害越大。陈云说，“包袱”的性质就是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里有个人的成分。但各级领导干部的“包袱”是不同的。他形象地描述道：“下级干部虽然背个人主义这个‘包袱’，但他只能背那么多。比如当一个连长，他只能背一条被单，两双鞋子，一包牙粉，一把牙刷，身上只有这一点。”他指出，就个人而言，为实现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增加个人的力量。增加力量的方法，就是又增加又要减少，增加就是要学习，减少就是要放下“包袱”，放下“包袱”也是增加力量。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人民期盼而作出的战略选择和庄严承诺。各级领导干部肩上都有沉甸甸的担子。要真正挑起这副担子，就必须增强责任意识，就必须丢掉“包袱”，以此来增加力量。丢“包袱”的办法，就是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领导干部因所处位置和作用不一样，其一言一行所带来的影响必然不一样，位置越高，影响越大。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责任担当意识，切实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坚决克服个人主义思想，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模范践行党的宗旨，努力担负起历史和人民寄予的重托。

重读经典